

中阿发展型共生的生成逻辑、实现路径 及世界意义^{*}

田文林 曾一涵

摘 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深化合作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当前，中阿关系在一系列多边行动中不断积累共生基础，推动双方关系由合作迈向更高层次的共生体系。共生意味着主体间理念认知与资源配置从对抗逻辑转向和合逻辑，而发展型共生则将共同发展转化为关系深化的内在动力，在持续合作中不断积累共同能力，塑造相互成就的新型国家关系。本文重点围绕中阿发展型共生的生成逻辑、实现路径及世界意义展开分析，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依存、战略自主的政治互动和多元包容的文明共识共同塑造了中阿发展型共生的基础，而经济互嵌、制度互构、文明互鉴则是其持续深化的重要路径。中阿发展型共生的独特性在于，其以发展为导向，以能源、投资、经贸、创新、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依托，推动安全、文明、治理维度的协同演进，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基于平等互利与能力共建的联合自强之路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范本。

关 键 词：中阿发展型共生；全球南方；经济互嵌；制度互构；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田文林，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曾一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5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5-0003-1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6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动荡变革期的地缘政治博弈的重点问题研究”（26XNSJ60）阶段性成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当今世界出现了两股截然相反的趋势和走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趋紧密,推动世界各国朝共存共生方向演进;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矛盾激化引发“相互依存武器化”,由此导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在世界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中阿合作的战略标本价值日趋凸显。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共同利益持续拓展,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合作基础愈加稳固,正朝着构建发展型共生的方向发展。这不仅符合双方现实利益需求,也为强化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成功典范和前期铺垫。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阐释。

一、中阿发展型共生的生成逻辑

中阿发展型共生是中阿命运与共历史逻辑的当代延续,同时也是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既无历史纠葛,也无现实领土争夺,双方交往始终秉承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明互鉴的交往原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由此凝聚成“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① 这一精神是中阿关系从古代文明交往、近代反殖民斗争到当代共同发展一以贯之的主线。从更大范围看,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的重大现实课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全球南方现代化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而必须置于新型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下,通过各国相互依存和相互成就来实现,并由此实现全球南方的共生与共荣。

中阿发展型共生的提出也源于对当代国际关系演进的理论回应。一般认为,现代国际体系具有经济、政治和体系三重属性:经济维度表现为发展差异基础上的相互依存,政治维度彰显出制度多样性下的权力竞争,体系维度则反映了规则约束与利益博弈相互交织。^② 换言之,国家行为体既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又始终面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结构。然而,随着动荡变革期的到来,国际社会愈发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协调差异与利益的思想指引。由此,一种“共生逻辑”便适时出场,其指向主体间理念认知与资源配置由对抗逻辑向和合逻辑转变的关系状态。而以发展锚定共生关系的发展型共生,则将共生逻辑落实到共同发展

① 习近平:《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405 页。

② 包刚升:《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339 页。

的实践之中。所谓发展型,是以发展作为组织社会关系和推动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这里的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财富的积累,更体现为主体能力的提升以及关系结构的优化。基于这一理解,发展型共生以相互依存为现实基础,以关系理性为交往准则,以多元共在为价值取向,形成兼具物质合作与理念认同的共生形态。并且,它将发展由国家本位的现代化目标拓展为塑造跨国关系的重要原则,推动安全、文明与治理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协同演进。当前,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都是全球南方中的重要方阵,中阿“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①。中阿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创新驱动、投资金融、能源合作、经贸互惠、人文交流),其目标不仅是双方互利共赢,更是“助力各自民族复兴,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②可见,中阿发展型共生正是在发展导向下,以“能源—投资—经贸—创新—人文”合作为依托,将安全、文明、治理等维度有机贯通,逐步形成整体联动的格局。

对全球南方而言,这一实践形态展现了一条基于平等互利与能力共建的联合自强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总体看,中阿发展型共生关系既立足当下现实,同时又具有一定超前性,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现实层面。

(一) 经济基础: 跨越剥削依附的相互依存关系

中阿经济关系的核心特征,在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心—边缘”的依附性剥削结构,代之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深度相互依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长期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格局:中心国家垄断资本、技术与高附加值环节,边缘国家被锁定为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导致其“去工业化”和贫困化、边缘化。^③而在这之中,财富向少数与外部资本结盟的精英阶层集中,形成“富裕的产油国”与“贫困的阿拉伯社会”并存的悖论。具体而言,中东北非地区长期面临较为突出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约57%的国民收入流向最富有的10%群体,而占人口一半的低收入群体仅获得约9%的收入。^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阿拉伯国家在依赖能源租金与外部资本的同时,制造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对有限。世界银行

①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426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年版,第143页。

③ 田文林:《西方对中东的意识形态渗透及其深远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第159页。

④ “What’s New About Inequ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2023?,”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November 22, 2023, <https://wid.world/news-article/2023-wid-update-mena/>, 上网时间:2026年6月21日。

数据显示,2024 年阿拉伯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仅为 12%,其中沙特为 16%,阿联酋仅 9%。^①若不改变这一格局,阿拉伯国家的依附性还将持续加深,并固化其在西方经济体系中的边缘位置。

相较之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这一价值取向在国际层面进一步体现为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②而这在中阿经济领域体现为两个关键的实践效应。其一,“全球价格革命”效应。这构成了对剥削结构的物质性冲击。中国凭借完整工业体系和规模效应,向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使中东民众以可负担成本享受现代技术进步的红利,打破了西方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刻意维持的工业品与非工业品之间价格“剪刀差”。其二,发展能力的共建效应。中国始终将提升阿拉伯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置于合作的重要位置,以此深化双方相互依存与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近年来,中国已稳居沙特、科威特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中科双边贸易额从 1971 年的 0.22 亿美元增至 2025 年的 185.8 亿美元。在伊拉克,中国企业在贡献约占全国一半原油产量的同时,持续投入教育、医疗与基础设施建设,2024 年社会贡献资金约 6,000 万美元;截至 2025 年,已有 54 名伊拉克学生通过奖学金项目赴华深造并返伊参与能源建设。^③这种从资源合作向产业培育与民生改善的延伸,增强了阿拉伯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也推动中阿合作由经济互补迈向发展共生。

(二) 政治基础:迈向战略自主的关系理性选择

近现代以来,战略自主性缺失构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其重要原因在于,西方霸权主导的地区秩序塑造不断加剧主权碎片化与安全赤字,进而制约了地区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同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外交取向的分化,又使阿拉伯国家长期陷于霍布斯式安全竞争之中。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当局通过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即扶植代理人、划分势力范围、操纵部族与教派矛盾等来瓦解阿拉伯世界统一潜力。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主要塑造者。美国在中东长期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1972 年至 2006 年期

①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 of GDP) — Arab World,”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locations=1A>, 上网时间:2026 年 6 月 21 日。

② 习近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 451 页。

③ 《新时代中阿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新华网,2026 年 5 月 13 日,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60513/e94a1da4541740169b162afba018b3cd/c.html>, 上网时间:2026 年 6 月 21 日。

间,美方否决了42项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这一数字比同期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否决总数还要多。^①此外,美国还直接军事介入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导致这些国家原有政权被武力推翻,并使这些国家失能长期化。在外部工具性干预与本地宗教、族群、民族主义矛盾交织作用下,中东长期陷入分裂与对立。

然而,阿拉伯国家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战略自主诉求。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之初便明确拒绝外部干涉。1981年起草的工作文件指出,“在这样一个有着同一声音、观点和力量的融合地区,外国的打算没有立足之地”;卡塔尔埃米尔更是直言:“达成我们目标的最好方式是主要地依赖我们自己”。^②从“位置性权力”(positional power)视角看,中等强国的影响力不只取决于物质实力,也取决于其在关系网络和制度竞争中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拓展的战略选择空间。^③2010年阿拉伯剧变以来,无论是动乱中承受美国打压的国家、转型期遭受民主化指责的国家,还是面临被抛弃压力的君主国,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霸权体系的挤压。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与欧美以外的大国合作能够形成对霸权国的“软制衡”,而中国恰好提供了这类战略资源。^④

与此同时,美国霸权的不得人心及其在中东的战略透支,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的外交立场立足关系理性,即在于相互敌意的最小化优先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⑤且始终延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与社会制度。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中东外交有着三重定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以政治手段解决争端,在充分尊重当事国意愿的前提下建设性介入;作为发展中国家,突出发展优先,在经济合作中倡导正确义利观;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倡导文明对话与多元共存,拒绝文明等级论。^⑥中阿政治互信正是在这种双向战略自主的路径上生成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和正确义利观宣示不寻求等级性控制,阿拉伯国家以多向联合证明不依附于单一权力中心。由此,中阿关系通过关系理性超越了工具理性的策略博弈,为构建具

① [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斯蒂芬·M. 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

② [美]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31-232页。

③ Amlan Mishra, “Positional Power: Middle Power Strategies in an Era of Institutional Rival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2, No. 4, July 2026, pp. 1287-1315.

④ 苏欣、张玉友:《伙伴关系:新时代中阿政治合作的互信构建与机制建设》,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8页。

⑤ 赵汀阳:《秩序的理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349页。

⑥ 田文林:《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中国特色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50-67页。

有自主性的发展型共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文明基础：突破文明同质的多元共在价值

西方对中东的霸权实践,不仅限于经济攫取与政治支配,更深入到文明叙事层面。霸权力量通过占据知识生产和意义解释的优势位置,将自身的文明价值标准普世化,就此形成了一种“诠释学霸权主义”。例如,西方领导人一再通过公开定义“真正”或“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教标准,将自己打造成事实上的解释者。这种态度使得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间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而在此框架下,个体的暴力行为被归咎于整个宗教,导致伊斯兰教形象扭曲,而这种形象反过来又被用于使“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①究其实质,所谓文明冲突不过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遮羞布。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指出,国际社会依旧还是一个由“文明国家”组成的排外性“俱乐部”,这些国家单方面决定其他行为体是否取得足够进步从而准许其作为平等主权行为体加入。^②这种等级性文明观通常将非西方文明建构为需要“开化”的“他者”,由此衍生出文明同质化政策。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明立场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更容易与阿拉伯世界实现文明互鉴。“兼容普遍主义”为代表的理念强调,普遍价值是基于对称的“关系”上而非单边的“个体”上,只有对称关系的合理性能获得普遍必然的证明。^③从历史实践看,中阿两大文明都具有较强的“统一意识”与包容性特征。受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观念和哈里发制度传统影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曾形成跨区域政治共同体,并在迅速扩展过程中将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不同文明纳入统一秩序之中,并推动伊斯兰文明与希腊、波斯、印度等文明持续互动。奥斯曼、莫卧儿和萨法维三大帝国不仅统治大量非穆斯林地区,其相互关系及对外互动也主要遵循王朝与帝国逻辑。^④如“奥斯曼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a)便体现了伊斯兰世界观向现实秩序的转化,其秩序理念将历史传统与未来愿景相结合,反映出一种以共同价值维系世界秩序的治理构想。^⑤

此外,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表明,文明互鉴往往以战略自主和实力支撑为前提。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深入交往,得益于双方较强的自主性;但工业

① [美]弗雷德·雷因哈德·达尔迈尔等编:《文明与世界秩序:地缘政治与文化差异》,王博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25 年版,第 34-35 页。

② [英]安德鲁·林克莱特:《文明进程与全球秩序》,肖茜等译,北京:中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70 页。

③ 赵汀阳:《秩序的理由》,第 304-305 页。

④ [英]巴里·布赞、[加]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李东琪、颜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5 年版,第 117-118 页。

⑤ [美]弗雷德·雷因哈德·达尔迈尔等编:《文明与世界秩序:地缘政治与文化差异》,第 128-129 页。

革命后西方扩张的冲击,则使中阿文明交流受到明显制约。^①当前,中阿双方也逐步在战略自主基础上重构文明关系。特别是在全球文明倡议下,通过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②为中阿文明对话与文明共生提供了理念遵循和实践路径。

由此可见,文化冲突的有效解决方式是“如何安置他者,如何与他者合作而创造最优的文化生态”。^③因而,在全球南方的秩序想象中,多元共在始终是一项重要价值追求。不同国家和文明在围绕发展、安全、治理等议题场域中形成共在般的持续互动,这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所强调的“世界政治是多元议题持续互动的过程”具有共振性。^④总之,基于相互尊重与文明互鉴,中阿发展型共生获得了多元共在的价值支撑。

二、中阿发展型共生的实现路径

发展研究的科学性,在于从具体历史进程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发展型共生实现路径的考察,应坚持历史分析与矛盾分析相统一,在现实发展中把握共生关系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机制。如前所述,中阿发展型共生的构建符合理论逻辑、具备现实基础,但并不等于这一关系就是与生俱来或一帆风顺的,也不意味着这一关系即要求消解客观存在的差异与分歧。相反,这需要双方共同发力,将客观联系转化为制度联结,将合作需求转化为共同认同,最终形成能够抵御风险冲击并实现持续发展的共生关系。

(一) 经济互嵌: 强化发展型共生的韧性结构

经济互嵌指向双方的物质性关联。中阿经济合作中长期存在些许张力。例如,以资源交换为主的合作形态仍未摆脱对外部环境的被动依赖,一旦国际政治冲突升级或全球市场剧烈波动,双方的发展议程便容易为外部变量所牵制。为此,经济互嵌不能止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还必须形成具有内生韧性的共生结构。

具体而言,双方应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协同布局,深化多层次、跨领域合作。当前,中阿合作正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资源、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拓展,横向上拓宽利益覆盖面,纵向深化从贸易到生产再到创新的全链条组

① 丁俊、李清扬:《中阿文明交流:历史机理、现实关切与前景展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5年第1期,第15-16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年版,第65页。

③ 赵汀阳:《秩序的理由》,第91页。

④ [美]海伦·米尔纳、[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编:《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相互依存与非国家行为体》,董昭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第240页。

合。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全部 22 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均已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沙特“2030 愿景”、埃及“2030 愿景”、阿联酋“2031 愿景”等国家战略正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合作重心逐步从贸易流通转向产业协同。中方参与阿拉伯国家总装机容量超过 300 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华为等中国企业已成为阿拉伯国家 5G 通信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双方将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方面共建 10 家联合实验室。^①与此同时,以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合资项目为例,沙特通过保障每日 100 万桶原油供应推动中国“油转化”发展。^②并且,围绕能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众多阿拉伯企业已在中国投资;在 2022 年,阿拉伯国家对华新增投资达 10.5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9 倍。^③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产业联系不断加深,中阿经济结构也将越来越具有自我强化与延续的能力。

除此之外,发展型国家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通过发挥国家战略规划和宏观引导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推进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建设,能够有效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但如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或将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以及削弱发展的可持续性。^④正是在吸收这一经验并回应其局限的基础上,中阿发展型共生更加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在现代化发展的共同需求下,双方通过战略对接和前瞻布局,不断拓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航天科技等新兴合作领域。这种形式更加注重能力建设和产业培育,而非围绕战略资源控制形成单向依附,有助于部分阿拉伯国家逐步摆脱对资源型经济的路径依赖,增强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更重要的是,中阿合作所共享的也非某种既定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需与本土文明传承相融共生,需兼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这样才能打造更具持续性与韧性的发展模式。换言之,在现代化实践中,“各种现存的发展‘模式’是不能重复的,而且发达社会的‘模式’也不应成为争取实现的目标”^⑤。因而,在双边平等互利的共同探索下,阿拉伯国家能够相对自主地选择发展方向,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路径。

① 《新时代中阿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

② “China’s Sinopec Signs Joint Venture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mco Worth \$4 Billion,” *Asharq Al-Awsat*, April 29, 2025, <https://english.aawsat.com/business/5137445-china%E2%80%99s-sinopec-signs-joint-venture-agreement-saudi-aramco-worth-4-billion>, 上网时间:2026 年 6 月 24 日。

③ 李增辉、王珂、张文:《共创新机遇 共享新未来——写在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之际》,载《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21 日第 18 版。

④ 郁建兴、刘涛:《超越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载《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4-6 页。

⑤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修订增补版)》,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1 页。

（二）制度互构：塑造发展型共生的稳定保障

制度互构是通过建设性制度实践来保障中阿发展型共生的稳定性,这是双方基于关系理性选择与现实问题需求所搭建的合作路径。不可忽视的是,相互依存仅是“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其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的区别,只有程度大小之分”^①。随着中阿经济互嵌不断深化,双方合作也进入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新阶段,如何突破传统合作模式的路径依赖和应对发展阶段差异,成为亟需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也更容易通过能源供应与投资建设等方面的脆弱性影响双方合作,这说明稳定的安全环境已成为中阿合作持续深化的重要保障。这也印证了一个观点,即“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强和政策空间密度的增加,对国际机制的需求可能会不断增加”^②。为此,中阿发展型共生的制度互构必须兼顾两个层面:在经贸领域完善规则协调与对话协商机制,为日益紧密的经济依存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在安全领域则通过搭建多边建设性介入渠道,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发展合作创造基本的安全环境。

从国际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稳定的国际合作在利益深化之上,还需要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加以维系。在此过程中,共识性的国际正义观为双边制度互构提供规范引领。其所强调的是,国家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处理彼此权利义务,以共同利益推动合作,在持续互动中逐步积累政治互信,形成共同认同,进而为长期合作建立稳定预期。当下,中国正积极倡导突破“中心—外围”的旧秩序,超越“强权即公理”的错误逻辑,摒弃“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以此开辟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境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③ 对于长期受到地区冲突和外部干预影响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坚持平等协商、尊重自主发展道路、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等发展理念,与其维护战略自主、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诉求具有较高契合性。

实际上,中阿双方的一系列行动也将塑造一种“契约性环境”,在这之中“可以促成更多的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的出现”。^④ 近年来,中方积极推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中阿制度互构提供了实践支撑。无论是推动沙特和伊朗

①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2026年6月)》,载《人民日报》2026年6月18日,第4版。

④ [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1页。

恢复外交关系,还是促成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在于,通过对话协商重塑互动关系,使分歧管控与利益协调逐渐成为维护地区秩序的重要方式。2026 年美以伊冲突发生后,中方持续开展外交斡旋。习近平主席围绕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四点主张,^①进一步体现了以发展促进安全、以合作维护和平的理念取向。归根到底,中阿发展型共生下的制度互构,其意义正在于将和平与发展纳入同一实践轨道,使发展不断巩固和平的现实成果,也使和平持续拓展发展的空间。

(三) 文明互鉴: 夯实发展型共生的价值基础

“文化为规则提供了支持。”^②对于中阿发展型共生而言,文明互鉴为其提供着持续稳定的人文价值支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层预设,是将差异(如发展阶段差异、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视为冲突的潜在根源。这种预设是欧洲数百年战争史的思维投射。“霍布斯式历史叙事到韦伯式学术概念,共同点是政治是一种对抗性(竞争性)分配资源的活动”。^③在这一框架中,差异被“置于一度距离之外”,在其他国家的边界内予以管理;而通过捍卫边界,“他者”被阻止在外,共同体的内部则被转化为同一性。^④然而,在一个文化与道德伦理都极为复杂的世界里,如果无法倾听他者的声音,就很难“讲得通”,也很难知道如何继续。^⑤

值得欣慰的是,全球化“以一种更加多向的方式动员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从而使对文明差异的单维描述变得毫无意义”^⑥。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并非走向一个单一的整体,“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帝国、战争和意识形态都有着独特的发展逻辑,但每一种逻辑都彼此相互作用”^⑦。不同力量逻辑的交织叠加,使国际社会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与重构之中,这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将长期面对全球性风险挑

① 温馨:《习近平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载《人民日报》2026 年 4 月 15 日,第 1 版。

② [美]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孙吉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年,第 113 页。

③ 杨光斌:《政治的概念: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313-314 页。

④ [美]纳伊姆·伊纳亚图拉、[美]戴维·布莱尼:《国际关系中的差异问题》,曾向红、杨双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7 页。

⑤ 同上,第 259-260 页。

⑥ [美]弗雷德·雷因哈德·达尔迈尔等编:《文明与世界秩序:地缘政治与文化差异》,第 132 页。

⑦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郭台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 页。

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换言之,全球化应被视为不同文明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历史的开放过程。由此,中阿发展型共生中的文明互鉴将以此为经验,即围绕共同发展开展文明对话,在回应共同关切中深化彼此理解。

实际上,文明互鉴的生命力最终来自人与人的持续交往。现代生活方式的广泛联结使得不同文化群体在日常互动中能够不断增进理解。而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往往发生于持续交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之中。正因如此,《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主张“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包容互鉴、和谐共处”。^①同时,宣言将文明交流从文化展示层面提升到知识生产和价值创造的层面,倡导通过教育、科技、青年等多层次机制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使文明互鉴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公共资源。^②中阿文明交流实践与宣言精神一脉相承,并已累积诸多成果。截至2024年,已有十五个阿拉伯国家在高校开设中文课程,六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同时,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学生选择来华留学,2004年至2016年间年均增长率达26%。而随着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中文教育已逐步与产业合作相结合。围绕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的发展需求,双方探索了“中文+职业技能”的培养模式,为能源、基建、农业、科技等200余个合作项目提供语言和专业人才支撑。^③语言交流正不断转化为推动发展合作的重要社会资源。此外,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覆盖双方70余所高校,在共建平台、联合科研、校际互访等方面走向制度化与集群化。“中沙文化年”以电竞文旅嘉年华、当代艺术展、文学沙龙等横跨多个领域的活动,让民众获得近距离感知对方文明的窗口。^④可见,诸多中阿文化互鉴行动正为中阿发展型共生提供持久稳定的文化与价值支撑。

三、构建中阿发展型共生的世界意义

当前,世界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自主性与依附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公平正义与霸权等级等方向相反的力量,试图将整个世界拉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和轨道。在此背景下,建设中阿发展型共生关系,不仅对中阿双方意义重大,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世界意义。

① 《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载《人民日报》2025年7月12日,第3版。

② 同上。

③ 汪敏锋:《润泽中阿新丝路——中文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与互鉴》,载《光明日报》2024年6月6日,第14版。

④ 周詮杰:《中阿人文交流绘就文明互鉴新篇章》,载《人民政协报》2025年11月22日,第4版。

（一）中阿双方是超越依附性关系的双向赋能

对中阿双方而言,发展型共生的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超越依附性发展的关系形态,即保持各自政治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打破等级化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关键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进而由边际报酬递减趋势转向边际报酬递增趋势。而竞争优势战略的核心是“边干边学”,但其能否得到有效应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家的价值观念在多大程度包含了崇尚变化与自主创新等内容。^①例如,中国的发展经验强调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强,自主发展与平等合作相统一,并基于不干涉原则以尊重既有社会结构和产权秩序的内生发展逻辑。^②在对内层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资本主义“扬弃”基础上产生的,明确了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③在对外层面,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优先”“普惠包容”等确立为核心原则,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④全球治理倡议也主张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⑤这些理念与行动无疑将为共生关系的构建注入符合国情的自主性灵魂。

与此同时,中阿发展型共生正将发展预期凝结为一系列共同承诺。承诺是“人类安排未来的一种独特方式,尽人力所能使未来变得可预见、可信赖”^⑥。在传统的依附关系中,承诺是单向的且有条件的恩惠,随时可能因施予方内部政治的变动而撤销;而中阿发展型共生内含着互嵌互构的承诺结构。例如,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推进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往往是通过技术转移与人力培训等方式,将一次性的工程交易转化为长期的能力培育承诺。此外,阿拉伯国家也通过持续深化战略对接,将对中国的合作意愿转化为稳定的制度性承诺。双方一系列举措正契合阿拉伯国家倡导“去工具化”的南南合作理念,推动合作由资本导向

① 田文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3 期,第 27 页。

② 殷之光:《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6 年版,第 125 页。

③ 田文林:《经济全球化的双重结构与百年变局下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 年第 1 期,第 55-56 页。

④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22 日,第 1 版。

⑤ 《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new/202509/t20250901_11699909.shtml, 上网时间:2026 年 6 月 26 日。

⑥ [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9 页。

和资源交换转向“平权”与“共治”。^① 由此观之,中阿关系的双向赋能亦是一种通过具体实践逐步累积信任,进而扩宽未来可能性的过程。

(二) 探索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型范式

联合自强源于全球南方国家对当代国际权力格局结构性暴力的共同回应。发展中国家越是处在大国力量边界线上的“中间地带”,越容易成为霸权国家地缘争夺的牺牲品。对于那些不听号令的国家,经济制裁、武力干涉更是屡见不鲜。在这种结构下,单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霸权国家,而是整个“集体西方”的制度性围堵。为此,全球南方国家只有携手共进,在重大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打破这一困局。^② 从不结盟运动到 77 国集团,从上合组织扩容到金砖机制扩员,这些跨区域平台的生长,本身就构成了一道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编织的制度缓冲带,为身处其中的国家提供了应对冲单边制裁与外部压力的集体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中阿发展型共生便在于它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政治依附的联合自强路径。

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实质是共同身份认同下的集体行动。美国长期从“文明例外论”“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出发看待伊斯兰文明,同时把亲美与反美的政治矛盾转换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矛盾,以此策动地区对抗并加剧紧张局势。^③ 这种操作的实质是对文明施加差异化手段来瓦解南方国家相互认同的可能。这背后反映出,集体身份形成的先决条件是行为体彼此视为同类,而西方的帝国主义历史将“南方”视为野蛮和黑暗的空间,系统性剥夺了南方国家彼此视为同类的认知基础。也因如此,全球南方在反向将“北方”界定为帝国主义和剥削性质的“他者”的过程中,才逐渐获得共同身份,并被赋予表达和追求共同利益的使命。^④ 正如和平秩序是经过数代人的制度创新与规范塑造才逐步奠定的,其持续性取决于能否建构并维系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准则”的“世界共同体”,^⑤而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使命便落在了形成类似的共同体之上。

实际上,这一使命已彰显于中国与全球南方不同区域合作的实践之中。例如,中非合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工业化合作为牵引,注重通过改善发展条件

① 丁隆、马晓美:《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话语战略转型与制度路径创新》,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 年第 6 期,第 76 页。

② 田文林:《联合自强是“全球南方”国家解困之道》,载《当代世界》2024 年第 2 期,第 73-74 页。

③ 刘中民:《从单边安全到共同安全:冷战后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进化》,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5 年第 4 期,第 62 页。

④ 李嘉伟:《“全球南方”概念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分析》,载《国际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133 页。

⑤ [德]比阿特丽斯·霍伊泽尔:《战略的演变:从古至今的战争思考》,年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46 页。

与培育产业能力提升非洲自主发展水平,形成了以能力建设为特征的发展合作模式。而中阿发展型共生的突出特点,在于以能源合作为战略基点,以提质转型为内生动力,以自主发展为共同导向,使不同层面的合作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体系,体现出由重点领域合作向整体性共生关系演进的趋势。而随着持续积累的实践转化为切实能力,中阿发展型共生所代表的联合自强,在获得现实发展红利的同时,还将在政治与文明等领域中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性与联合性。由此,联合自强将摆脱形式上的“抱团”,转向一种以共同发展不断生产共同力量并塑造共同未来的实践进程。

四、构建中阿发展型共生面临的风险挑战

构建中阿发展型共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漫长、充满了风险与挑战的过程。大体来说,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全球化逻辑的逆转与依附性结构的固化

经济相互依存在动荡变革期中遭受显著冲击。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强化,使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受到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因素影响,全球化逻辑也逐渐由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其中,相互依赖正在被转化为战略竞争工具。“武器化相互依赖”表明,掌握跨国网络关键节点的国家能够借助金融、技术和信息优势实施制裁与封锁。^① 在此背景下,中阿经济共生面临联通受限和合作承压等多重挑战。

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全球化依附性结构的影响更为深远。长期以来,中东产油国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财政与外汇收入深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巨额收入中的大部分并未转化为本土工业投资,而是投向发达国家市场。^② 由此还产生了一种“依赖文化”,即“国民对国家的依赖,以及这些社会对发达国家的依赖”。^③ 此外,地缘动荡严重影响本地经济发展,这在 2026 年美以伊冲突中集中显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能源供应中断以及供应链震荡,石油、天然气、化肥等大宗商品价格同步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 2026 年经济增速将由战前预期大幅下调至 1.4%,较此前

①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Summer 2019, pp. 74–79.

② 田文林:《漫长的黎明:世界历史进程下的中东》,北京:时事出版社 2026 年版,第 60–62 页。

③ [美]拉希德·哈立迪:《复辟帝国:西方的足迹与美国在中东的危险之路》,王霆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05 页。

预测下降 2.3 个百分点,其中海湾主要产油国经济增速最高下调约 15 个百分点。^① 更富警示意义的是,长期以来由美国安全承诺所维系的海湾地区安全发展预期受到严重冲击。战争爆发后的前十天内,伊朗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超过 80% 的攻击指向海湾国家;相关袭击不仅针对驻地的美军设施,也使海水淡化厂、能源设施、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面临安全风险。^② 可见,在经济依附与安全脆弱性的双重制约下,中阿发展型共生所依托的相互依存格局,始终面临被外部力量干扰乃至破坏的风险。

(二) 霸权逻辑持续扰动下的自主性受限

在客观结构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虽呈收缩态势,但远未退出。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残余霸权”(residual hegemony)形态,认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主导地位虽有所弱化,但其长期塑造的安全体系仍具有较强延续性,并通过武器技术依赖、美军基础设施网络以及军事培训与安全文化塑造持续影响地区秩序。^③ 在这种嵌入式结构下,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安全架构上仍将长期嵌入美国主导的体系网络,战略自主的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在主观行动上,霸权逻辑的破坏性介入还将长期存在,这无疑将迟滞本地的安全自主性的整合进程。如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言,“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规范可以成为强国剥削弱国的幌子”^④。实际上,这种介入逻辑不会因霸权衰落而丧失活力,反而还会催生更加迫切的“泛安全化”趋势,即将众多原本属于经济、技术或社会领域的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使安全边界、范畴与维护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其本质是对绝对安全和权力优势无止境的追求。^⑤ 在这种逻辑下,中阿正常开展的经贸合作与政治协作,往往容易被霸权置于安全竞争框架之中,从而成为其干预和遏制的重要对象。并且,与其他已形成制度化区域组织的地区不同,中东尚未建立稳定且具有持续协调能力的多边机制,政治与经济的分歧往往缺乏制度化缓冲,造成“众口难调”局面。以 2011 年巴林危机为例,海合会曾通过派遣“半岛盾牌”部队开展集体安全合作;但危机结束后,沙特推动

① “War in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Spillover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16, 202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26/04/16/regional-economic-outlook-middle-east-central-asia-april-2026>, 上网时间:2026 年 6 月 27 日。

② Emile Hokayem, “The War Against Iran,” *Survival*, Vol. 68, No. 2, 2026, pp. 45–46.

③ David B Roberts, “The Gulf’s Evolving Security Mosaic: Balancing the Manifest Retrenchment and Latent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No. 6, November 2025, pp. 2193–2214.

④ [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第 252 页。

⑤ 卢凌宇、崔磊:《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81–82 页。

海合会扩员因成员国担忧其扩大地区主导权而受阻。^① 若外部霸权以相应手段进行介入,地区国家极可能因缺乏集体协调机制而难以形成有效回应,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分散应对反而可能加剧相互猜忌,进一步削弱区域集体行动能力。而当霸权的外部干扰与区域内部的制度缺失相互强化时,关系理性所谋求的战略自主将面临难以摆脱的结构性压力。

(三) 人文交流中的内生性阻隔

中阿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长期良性互动。近代以来,双方各自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摸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对自身文明主体性的自觉意识都逐步加深。就阿拉伯世界而言,现代化的路径长期与西方化纠缠在一起,发展道路的选择由此日益带有文明归属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维护文化传统与保持文明主体性成为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关切,外部文化影响也由此更容易被审慎对待。

这种审慎态度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教俗关系存在的巨大张力密切关联。在阿拉伯世界中,政治伊斯兰拒绝接受世俗主义,反对民族国家概念,认为穆斯林只应忠诚于乌玛。这种价值观使其先天具有道统优势,在民众中颇具号召力。^② 然而,中东国家效仿西方进行世俗化改革,导致道统与法统分离,并且中东世俗国家普遍存在合法性不足问题,不得不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长期摇摆。所有伊斯兰国家注定要在两件事情中选择一件:拒绝伊斯兰要素,选择一个世俗的国家;要么为努力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秩序的艰苦奋斗进行到底。2011 年中东剧变后,部分国家世俗威权政权倒台与政治伊斯兰的再度兴起,本质上是对长期世俗主义发展路径的一种修正与回应。^③ 这种教俗力量对峙的背景,客观上增加了中阿文明互鉴的复杂性。

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伊斯兰法学思想和神学体系在 10 世纪逐渐程式化之后,社会思想活力与制度创新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而自 17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和全球力量格局的变迁,伊斯兰世界经历了从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的历史转折。特别是 1699 年《卡洛维茨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伊斯兰传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范式开始全面走向衰势。”^④ 思想层面的相对保守与外部世界的持续冲击相互叠加,不仅加剧了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困境,也积累了文明失落感的创伤。有学者坦言,“中东地区有一种帝国怀旧情结与弥赛亚主义

① 张楚楚:《共同威胁、感知错位与中东地区安全合作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 年第 5 期,第 82 页。

②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3-44 页。

③ 田文林:《漫长的黎明:世界历史进程下的中东》,第 138-142 页。

④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05-507 页

激情的混合,这恐怕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①。在内外因素作用下,阿拉伯世界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文明心理,其既希望借鉴外部经验推动现代化,又高度重视本土文化传统与宗教价值的延续性。因此,中阿发展型共生建设在除推动文明对话之外,还需要立足阿拉伯社会长期积淀的历史感受与文化传统,回应其对于国际秩序重塑和自主发展道路的现实期待,以共同发展的实践承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战略选择。

五、结语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变革期,当国际秩序不断经历分化与重组,不同国家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共同生活,便成为值得深思的时代课题。长久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权力扩张与秩序重建,也留下了依附、干预和对抗不断循环的历史记忆。

时至今日,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种满足共愿的变革。而中阿发展型共生的探索即是回应时代需求。它的生动写照是“以发展促合作、以发展增互信、以发展聚共识、以发展谋安全、以发展筑和平”,通过共同发展不断积累共同能力,持续拓展共同利益,并塑造相互成就的共同未来。这种探索未必能够立即改变世界,却也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霸权支配和零和博弈的发展可能。中阿发展型共生既是中阿现实合作的重要路径,也是全球南方探索联合自强的代表性实践。然而,未来世界究竟走向对抗还是合作,答案或许不会产生于某些单一国家的力量,而将在越来越多平等、包容、互利的关系实践中逐步形成。可见,国际社会中共生关系的构建与深化,是一项需要长期实践、持续投入的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章 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① [法] 伯特兰·巴迪:《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宗华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1 页。